

□ 倪富靜

陆世仪，字道威，号刚斋，晚号桴亭，江苏太仓人，明末清初思想家，生于明神宗万历三十九年（1611），卒于清康熙十一年（1672），享年62岁。桴亭处明清易代之际，虽毕生无缘仕途，但始终不改经世济民之志。桴亭博洽多闻，在世时即得亭林“吾世真儒”之誉；其学“主于敦守礼法，不虚谈诚敬之旨，施行实政，不空为心性之功”。张伯行赞其“以吾道为己任，抗颜设教，力矫时趋，黜华崇实，一惟考亭之规矩”。

大人之学 内圣外王

桴亭说：“《学而》开章第一便说一‘学’字。在上古说这一个字不难，在今日便须要认清这一个字。”所谓“今日”，即他所处的明末清初。明代中期以来，诸多学人流于冥想体验、拒不观书的歧途，学界风气一度虚浮，社会风气一度恶化。

有鉴于此，桴亭极力申明“学”之重要，特别是“大学”之重要。儒门经典《大学》开篇有言，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”，朱熹注曰：“大学者，大人之学也。”何谓“大人之学”？即修己治人、内圣外王之学。桴亭讲：“古者之学，主于修己治人，今则口耳沾毕而已，不知于朝廷何补？”

“修己治人”，即《论语》所讲的“修己以敬”“修己以安人”“修己以安百姓”；“内圣外王”，即《大学》所讲的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。古来圣贤无不以修己治人、内圣外王为人生目标。修己是治人之前提，内圣是外王之发端。因此桴亭指出，人要先学《西铭》，认识万物一体之气象，

开拓心胸，再学象山宏阔之论，感发兴起大人之志，进而成就修己治人之责任担当，即“要实见得道为天地间不可无之道，学为天地间不可无之学，我为天地间不可少之人”。

大人之志固然重要，大人之业尤为根本，否则必将导向好高骛远、阔略伦物之弊。桴亭说：“近世讲学多似晋人清谈，清谈甚害事，孔门无一语不教人就实处做。”所谓“近世清谈”，即明朝正、嘉、隆、万之际的舌占门户之争。其结果便是学风、政风的日益堕落与腐败，最后走向国破家亡。孔子强调“敏于事而慎于言”“先行其言而后从之”，就是担心人们“言过其实”。

所以，桴亭所重视的大人之业，就是扎扎实实读书学习与社会实践。他说：“学问从致知得者较浅，从力行得者较深，所谓躬行心得也。”比如当下学习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六艺古法的时候，就不能拘泥于原有的理论方法，必须结合现实实践来学习，即“相今时宜、酌而行之”，万不可生搬硬套、亦步亦趋。

当然，不止六艺之学，凡是有助于治国安邦的知识，都是大人之学的内容。桴亭讲：“今人所当学者，正不止六艺，如天文、地理、河渠、兵法之类，皆切于用世，不可不讲。俗儒不知内圣外王之学，徒高谈性命，无补于世。”

从仕途第一站，他就扣好了人生第一粒扣子，谨守廉洁之则。汤斌骑着骡子，带着破被褥、竹书箱，在赴任潼关路上，甚至被潼关守关把总瞧不起：“把你放到锅里煮也煮不出个官味来。”就是这样的汤斌，此后一直以身作则，以廉洁自守要求自己。1684年，康熙亲自点名汤斌出任江苏巡抚，临行前，对汤斌说：“做官应以正风俗为先。江苏习俗崇尚奢侈，应该努力教化引导，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成的事，一定要慢慢地进行，使他们改变原来的观念。”汤斌铭记康熙教诲。上任后，汤斌告诫臣僚：“我不要你们的钱，你们不准要知府的钱，知府不准要州县的钱，州县不准要百姓的钱。”在廉洁自守这一点上，他真正做到了以身作则。因其每餐只有一块豆腐，百姓亲切地称其为“豆腐汤巡抚”。

独出淤泥

古代循吏即使身处不良风气之中，仍能出淤泥而不染，真正做到廉洁守身，这点实属难得。“有局量，立行清苦”的柳俭在由前朝入仕隋朝过程中，能够独扛风气。隋政权是依靠武官撑起执政基础的，而柳俭是以文官身份成为地方大员的，在他主政一方之时，能够对不尊法度、祸害地方的武官行为进行纠正和严惩。他担任广汉太守时，严惩贪赃枉法之徒，净化了当地政治生态；担任蓬州刺史时，为官清廉，不敛钱物，营造了风清气正的政治气候。因品行端正、不善逢迎，柳俭得罪了蜀王杨秀而被免官。柳俭还乡时，“乘敝车羸马，妻子衣食不贍”，清正之风从中可见一斑。隋炀帝即位后，政风逐渐恶劣，柳俭仍然能够做到洁身自好。他在出任弘化太守后，将所受俸禄尽数散发给属吏，又严办仗势欺人之豪强。当时，他的清名天下传颂。

古代循吏在宦海生涯中，由于敢于清廉自守，留清名在外，亦遭到了朝野舆论的攻击或好心的“劝导”，然而，他们仍然能够摒弃流俗，敢于坚持己见，真正做到不被流俗所染。唐朝名臣陆贽在出任宰相后，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，一概拒绝地方藩镇的重金拉拢。他的行为得罪了一些奸邪小人，“沾名钓誉”之说随之加在他的头上。唐德宗了解这件事后，下密旨责备陆贽“清慎太过”，并劝导他：“如不接受贵重财物，细小物品受亦无妨。”善于为文的陆贽没有顾虑皇权权威，在为文复唐德宗的疏中告诫皇帝，不能从细节小处放松警惕：“利于小者必害于大，贿道一开，展转滋甚，

实践实修 论道不苟

桴亭生于一个“五世理学诸生”之家，自来即以内圣外王为人生追求。他天资卓犖，自性通明，但从不因才废学。他说：“人一刻不进学，对草木亦皆可愧。”因此，他自幼即好学深思、笃志不怠。尤为重要的是，桴亭为学务在实践实修、切磋琢磨，从不作浮华之论、虚伪之行。

桴亭七岁学习以《大学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，12岁出口成章，以“独向高冈择木栖，更无鸛鹭与相齐。一声叫彻虞廷日，四海鸚鵡不敢欺”题词《百鸟朝凤》图。23岁时，桴亭预感到天下不久将乱，“又见天下人材落落，颇为自负，欲为盖世奇男子”，计划外出领兵平定叛乱，故而与好友陈瑚一道拜石敬严将军为师，共同学习战阵兵法。随着学习的深入，桴亭由最初的横槊舞剑转向兵阵法。他广泛学习并评述前人留下的“太极八阵图”“鸳鸯阵法”等，最后还写成《八阵发明》一书。

与此同时，桴亭也没有忽略自我内在修养。他早年自行修习袁了凡功过格，提升内在修养。但不久便发现许多问题，故而放弃袁氏之法。26岁时，桴亭作《格致编》，以天理、人欲为标准划分善、过，从而检验自己的

鞭鞑不已，必及衣裘，衣裘不已，必及金璧。”陆贽深刻地剖析了“贿道一开”的危害：“伤风害礼，莫甚于私；暴物残人，莫大于赂。”陆贽没有奉皇帝之诏，这股清流为当时政治注入了清廉之风和生机活力。

金刚不坏

古代循吏在追逐自己梦想的时候，能够做到不染一尘，炼就金刚不坏之身。戴震在为一代廉臣王敏撰写的传记中，称赞他身上具有“廉洁自持”的品格。王敏曾遭遇灾年，每两天才吃一顿饭。他的弟弟给他带来了丰裕的钱财，让他用来买食物，遭到他拒绝；“奈何干人败家风？”他命令其弟把钱财拿走。他的朋友了解到他的贫困境遇后“欲有赠”。其友袖子中带着银子，来到王敏家中呆了一天，回去的时候银子又被带回去了，因为王敏不受。时人有感于他的清廉自持，称其为“王廉士”。从王敏身上可以看出“富以苟，不如贫以誉”对他的深刻影响。廉洁自持使他获得了众多赞誉。

古代循吏在仕途生涯中，虽能干且清廉，但也会遭遇官场潜规则，然而，他们能够打破官场潜规则，身正影正，树立起清官这面旗帜，赢得了良好官声。康熙时期名臣张伯行在1706年被提升为江苏按察使，是当时巡抚的属下。当时官场流行送礼之风，新任官员要给巡抚、总督等上司送礼，期其能提携。张伯行廉洁自持、秉性耿直，对此腐败习气深恶痛绝：“我为官，誓不取民一钱，安能办此！”他拒绝收礼送礼，打破当地官场潜规则，得罪了总督和巡抚，受到他们的排挤。1707年，康熙帝巡江苏，在当地总督和巡抚举荐名单中，没有看到具备良好官声的张伯行，就质疑总督、巡抚举荐不公。康熙当场破格提拔张伯行为福建巡抚。1709年，张伯行调任江苏出任巡抚，上任后，颁布檄文《禁止馈送檄》，严禁下属馈送钱财物：“一黍一铢，尽民脂膏。宽一分，民即受一分之赐；要一文，身即受一文之污。”写这段檄文既有感于他自己的所见所感，也是对时下风气的感遇和对臣僚的提醒。他也由此成为名重一时的清官循吏。



力矫时趋 黜华崇实

——明末清初的名士陆桴亭

道德行为。27岁之时，桴亭又自创“考德”“课业”二格，每日夜晚实录白天所做之事与所读之书，从而考验自己的学问及德行的进展情况。桴亭注重自修，但力戒冥想静坐，着重强调在实践实修中提高自我道德素养。

29岁之后，桴亭开始外出讲学论道。在淮云寺讲学之时，讲会设讲规六条、罚规六条，目的就是为了让亲实践，从而为作圣贤打下良好的基础。而立之年，桴亭讲学蔚蔚山房，定岁会、月会、旬会、时会之礼，设考德、课业、讲论、记诵、经义、治事、问答、游泳共八科，又立约法十章、斋戒之条十则、纪事之法十则，且均“严惮以从事，畏敬以奉行”。此后，不论是在东林书院还是在荆川大儒祠，桴亭讲学依旧实学实论一如往日。此外，桴亭还与归庄、史孝威等三十多位学者往来论道，与宋子犹、曹尊素等学者往来书信论学四十余次。

正是因为桴亭讲学论道都能实践实修、严肃不苟，所以，其学才能广博宏阔、经世致用。桴亭一生笔耕不辍，著述多达六十余种，“其论学诸书于理气心性之微、幽明昼夜之故、井田学校之大、兵刑水利之繁，一一核实讲求，为若指掌。盖所得如此，故能龙蛰蠖曲，与顾、黄诸子通晦旨、起衰元，存身而得求信之道”。不过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桴亭实际上并未能与

顾炎武、黄宗羲等人并闻于世。但是，其学术之精深切实是不容质疑的，如全祖望所言：“国初儒者，曰孙夏峰、黄梨洲、李二曲最有名，而桴亭先生少知者。及读其书，而叹其学之邃。”

恒定坚持 实言实行

明崇祯五年（1632），桴亭 22岁，补苏州府学诸生，仍旧用心于科举考试。明崇祯十五年（1642）至十六年（1643）之际，桴亭绝意圭组，悉心著述，彻底告别科考，终其一生都未再涉仕途。不过，桴亭并未沉浸于道德修养、闭门论道，也未失意于科考不顺，而是始终坚持终身关切国家大事、民族兴亡的信条。

明崇祯十四年（1641），桴亭 31岁。吴地遇到严重的饥荒之灾，“人相食道路，僵仆者相望”。桴亭见之不忍，于是相约同志、好友一起筹建同善会，筹集募捐钱财和米粮，拯救了无数流离失所的饥民。与此同时，桴亭还悉心思考系统的救灾策略，最后撰成《常平权法》与《救荒五议》，上呈给当州执事。此年夏天，太仓州牧钱肃乐因受前任知州弊政牵连，即将被朝廷罢黜免官。由于其“治蒔有惠政”，深得百姓爱戴。桴亭也认为“江

南大旱，蒔地尤岌岌，一日不可无钱公”，于是与士民一道前往京口挽留之。

甲申之变之年，桴亭 34岁。有感于国变易代、南明腐朽之现实，桴亭作《匡时臆论》，提出“定内志、去积习、励乾德、列屯守、决恢复、明军法、备巡幸、固长江、清京师、重禁卫、整卫所、理财用、求人材、慎制举”之策略，上呈南明当局。此年，“蒔江全塞，吴中复大旱，民病于漕”。桴亭忧心不已，立时作《改折始末论》上呈郡守，积极奔走呼号，最终为当地百姓争取到“漕粮改折三分”的惠政。

清顺治十八年（1661），桴亭 51岁。这年秋天，桴亭接受江西安义令毛如石之聘，成为其幕僚。期间，在“明政刑、正风俗、锄奸仇”等工作方面，桴亭倾力相助颇多。正是为答谢桴亭助益之功，毛如石于此年冬天捐俸出资刊刻了桴亭代表作《思辨录辑要》的《前集》部分。

清康熙十一年（1672）正月二十日辰时，桴亭因病离世，走完了他勇于自修、笃志圣道、致知力行、担当自任的一生。门人弟子效仿古圣前贤之例，私谥“尊道”“文潜”。

桴亭说：“果若有恒，自能转世界，而不为世界所转。”正是由于对“各务躬行、各敦实行”理念的恒定坚持，桴亭才会一生实言实行、针砭时弊，在政治、教育、经济改革方面提出诸多真知灼见，为乡邑事务、父老生计做出许多有益贡献。



孝公“护法”

□ 崔 庆

秦献公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收复河西故地，但是壮志未酬。献公年过不惑，方有子渠梁，对他寄予厚望。孝公和献公有强烈的父子共鸣，儿子深刻领会父亲“且欲东伐”的用意，就是要“复穆公之故地，修穆公之政令”，孝公终身以此为己任。

商鞅入秦，三次覲见，唯宣霸道，进富国强兵之策，才打动孝公。可见在孝公心中，有强烈的主观看法和清晰的远景规划，商鞅是尽辅佐之力。之后秦国巨变，与其说归因于商鞅变法，还不如说主要归因于孝公护法，护的是献公兴国图强之法。

何去何从

秦献公六年（公元前379年），田代齐姜；秦献公九年，魏、赵、韩灭晋而三分其地。晋和齐这两个昔日强大的对手，在激烈残酷的对外竞争中没有服输，却相继倒在了错综复杂的内部斗争中，这不仅让秦献公深受震动，也在孝公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：分则弱，滞则亡。

孝公的秦国，虽然经过献公的努力，中央政府得到加强，但是国内旧势力根深蒂固，对于献公开启的变革心怀不满，涓涓暗流随时可能变成波涛汹涌。要对继续变革的道路充满信心，才能沿着振兴秦国的道路坚定走下去。孝公继位后马上颁布求贤令，“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，吾且尊官，与之分土”，渴望图强之意溢于言表。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，成天下大事，须广有天下之才，孝公吹响了强秦的集结号。

帝国重构

由春秋入战国，各国都在奋起，每一段平静的日子都是难得的发展窗口期。颁布求贤令后，孝公喜得商鞅，但是没有贸然采取行动。孝公绝对是一位“微操”大师，他和商鞅的行动是从“小动作”开始的。商鞅在秦蛰伏三年，始论变法。朝堂之上，与世族大臣甘龙、杜挚激辩，再次宣扬了孝公的决心。

孝公三年（公元前359年），秦国颁布《垦草令》。此令表面是以粮为纲、以农为本，更深层的意义在于，孝公从底层动员了民众，动摇世家贵族的旧势力。孝公“小步快跑”，三年一台阶，孝公六年，正式

任命卫鞅担任左庶长，徐徐拉开大幕。孝公心中有一幅宏伟蓝图，一是决裂阡陌、鼓励开荒垦田，二是推行县制、强健国家筋骨，三是“初为赋”、建立国家财政，以此三策重塑秦国结构。

献公大胆探索县制，秦孝公彻底推广县制，聚小乡小邑为县，把全国分为了41个县。孝公还乘势强化垂直行政管理系统，孝公十三年，“初为县令，有秩史”，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县级行政机构的长官和辅佐人员。孝公十四年，“初为赋”，中央政府从县里收取税赋，国家机器开始启动。中央政令能够抵达国家末端，而全国的财力物力也能集中到中央政府，打通了大国经脉，秦国具备了惊人的动员力和爆发力。秦孝公十八年，秦国统一度量衡，为秦国崛起打造了坚实的底盘。

孝公肖于献公，时常反复回忆思考父亲当年韬略，从父亲的一言一行中探寻未来的家国之思路。献公继位不久，迁都栎阳，一是靠近前线，以便和魏国较量；二是脱离旧都，便于推进变革。孝公决意效法献公，再次迁都至咸阳。咸阳北依高原，南临渭河，顺流而下可入黄河，“据天下之上游，制天下之命者也”。迁都咸阳，有地势之利，也便于孝公放开手脚，在一张白纸上绘就变革的蓝图。

持续弱魏

秦国要崛起，魏国是越不过去的门槛，孝公和商鞅聚焦主要矛盾，策划演绎了一部传奇连环计，时而强抚，时而猛攻，缓急交替，持续弱魏。

孝公七年（公元前355年），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会盟，这是一场试探性的交往。秦孝公八年，赵国进攻卫国，卫国是魏国的小伙伴，于是赵魏冲突。魏国主力兵团围困赵都邯郸，赵向齐求援。齐军围魏救赵，与魏军大战于桂陵，消灭了虎狼统帅的魏国主力兵团。秦国乘机出兵攻魏，元里一战大获全胜，斩首七千，并占领魏国少梁。这是秦国变法后第一次对魏国的胜利。

孝公审时度势，以利相合，逐渐和齐、赵联手，三国对魏国形成了东西北合围之势。秦孝公二十一年（公元前341年），齐魏爆发马陵之战，魏国太子申统帅的主力兵团再次被齐国击溃，元气大伤。此战魏国无法对于齐国尽全力，因为其另一部主力兵团被秦国牵制。而且，马陵之战次年

（公元前340年），秦又与赵、齐联合伐魏，商鞅使诈，全歼公子卯统帅的魏军。

至此，魏国三大主力兵团消耗殆尽，迫于无奈，主动割让河西之地，向秦求和，并迁都大梁。十余年间，桂陵、元里、马陵等战波诡云谲，秦国在背后若隐若现，逐步实现了关键转折，取得了对魏国的优势。

远交近攻

三晋虽同出一门，但是魏赵韩不是铁板一块，他们竞相扩展，甚至自相攻伐。秦孝公继位之初（公元前361年），赵韩曾合兵攻打秦国。孝公并不以为意，他深深知道秦的对外关系中，魏国是主要矛盾，河西之地是核心利益，其他可以绥缓图之，赵韩甚至是可以拉拢的伙伴。

孝公时代，秦、韩两国接壤不多，韩不是秦国首要战略扩展方向，如果韩和秦站在一起，三晋就难以团结了。保持自己的平衡，而破坏三晋的平衡，秦国找准了切入口。经过多年的暗中和动员，秦孝公十四年（公元前348年），韩昭侯来朝，此后终孝公一朝，韩国始终是秦国的坚定盟友，没有参与任何针对秦国的联合军事行动。

盟韩、亲赵、攻魏，孝公“远交近攻”的阶段性战略思想初步形成，这是献公东进之策的具体化，取得了重大实效，逐步取得了对魏国的战略优势，日后范雎的建议是扩大版的战略升级，远交近攻由三晋推演至天下。

秦孝公具备极强的战略平衡感，东进大有收获，收复了“穆公之故地”，在南方还巩固了和楚国的“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”，孝公五年，“楚右尹黑来迎迓”。这一切是秦国内部变革的外在反映。

商鞅变法的成功举措和重要意义无需赘言，秦国在整体国力偏弱的情况下，取得了制度先发优势，在战国初年的复杂格局中领先一步。商鞅的背后是孝公，他意志坚定，全面继承献公遗志，精准实施总体战略，达到“务本力穡之效”。商鞅变法的实质是孝公护法，护的是献公兴国图强之法，秦国默默等待羽化成蝶、万弧挺刃的时刻。



廉洁自持的循吏

□ 石志刚

以身作则

桓宽在《盐铁论》中说：“欲正者端其表，欲下廉者先己身。”古代循吏在仕途生涯中，敏锐地判断到只要自己在高位以身作则的话，就能刷新吏治，整顿作风，形成风清气正的局面。被孔子称为“忠”的楚国令尹斗子文位居要职，作风却十分简朴，无论饮食和穿着，都对自己要求极严。当时，楚国财力贫乏，为了充足国库，斗子文以强烈的家国情怀感，带头毁家纾难，

古代循吏自幼读圣贤书，立志守节、清廉自守成为他们做人为官的座右铭。他们走上仕途，立志要实现自己治吏治国的抱负。康熙时期的名臣汤斌出生于明朝末年，虽遭逢乱世，但其家仍不废耕读传家之习。汤斌在追随其父辗转各地的过程中，目睹百姓艰辛，坚定了他读书做官为民的决心。公元1652年，汤斌进士及第，被顺治裁定为“品行清端，才猷瞻裕”。汤斌走上仕途的第一站是陕西潼关道副使，